

# 《项英传》有几处失实

徐君华

读了王辅一同志撰写的《项英传》，发现其中叙事有不实之处。现仅就其中《战斗在新四军》这一章，试举几例：

(一) 该书说：项英早在1938年2月14日，就提出了“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敌后进军的最早构想，为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确定新四军的行动方针提供了参考。”<sup>①</sup> 其依据是项英、陈毅致毛泽东的电报：

我军目前行动不宜全部集结岩寺。现首先以第一支队陈(毅)出动。第二支队张(鼎丞)则暂留闽、赣，借词到福州，领回何鸣部被缴枪支，并等统方七百支枪由大埔运到。第三支队则在陈实际到达之后再行动，现尚须补充被服。叶(挺)偕陈毅同志今晨去绩(屯)溪晤顾(祝同)，要求：

一、我军不住岩寺，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

二、二档正面开至备路之侧翼集结(指第二梯队开到预备集结的地区)。

三、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任务，机动完成。

四、到达广大的机动地区(既浙苏皖边境)，以令自由进退。至于本身，目前须要整理。如何能办到一面收一面整理，以营、连为单位交互使用部队。对集中，则如不能取得所希望之各地，则一面到岩寺，一面即出发前进，不在岩寺集结停留。<sup>②</sup>

① 《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4年版，第211页。

对照电报，再看一下实际情况：

第一，项英发这份电报的时候，南方各游击队正在下山集中，准备向皖南集结。电报提出部队到达皖南后，不宜全部集结于岩寺，应尽量前伸至苏浙皖边地区，这讲的是部队集结地域，根本没有“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敌后进军”的影子。

第二，电报所列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等地，当时尚未沦陷。向这些地区集结，还谈不上是“向敌后进军”，何来“向北发展”的“构想”？

第三，毛泽东2月15日复电：“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同时指出：“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sup>①</sup>可见，毛泽东否定了有关新四军向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等地配置的意见，把新四军发展方向定在敌后，并向北指了。

事实上，真正提出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敌后进军的发展方针的，是毛泽东1938年的“五四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sup>②</sup>这也就是1939年春，周恩来来到皖南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核心是向敌后发展，向北发展。项英2月14日电报中哪有这个构想？其实，项英长期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迟迟不执行中央关于军部北移的决策，株守皖南三年之久的事实，已经证明项英根本没有提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敌后进军”的“构想”的思想基础。所以，1941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项英错误的决定》才指出：项英的错误之一是“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212页。

② 同上，第111页。

后发展”。<sup>①</sup>而《项英传》所说早在“五四指示”下达之前80天，项英已经提出了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向敌后进军的“构想”，并为中央确定新四军的行动方针提供了“参考”，是不符合实际的。

(二)《项英传》说：“项英在党中央面前，没有说叶挺这不好，那不好，至少1939年和1940年两次给党中央的电报中，称叶挺在政治上对党有极大进步。这对叶挺后来能够恢复党籍是会有影响的。”<sup>②</sup>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

第一，项英在中共中央面前，不是没有说叶挺这不好，那不好，而是多次告叶挺的状。1938年3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挺认为可行，而项英认为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不应执行。3月18日项英在致毛泽东等的电报中称：在与三战区交涉新四军向敌后挺进路线和防区等问题时，“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sup>③</sup>他在4月29日致毛泽东电中又责怪“叶不能为我军据理力争”<sup>④</sup>等等。只是毛泽东没有“准”项英这一“状”，倒是看出了项英的思想顾虑，复电项英指出：“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毛并针对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情绪，告诫项英：“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sup>⑤</sup>然而，项、叶关系未见改善，以致叶挺产生去意。1938年10月23日，刚从延安返回皖南的项英致电中央军委和周恩来称：“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他要求周恩来跟蒋介石交涉解决新四军军长“继任人”问题。<sup>⑥</sup>11月2日，周恩来、叶剑英从长沙致电项英：“为着统一战线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181页。

② 《项英传》，第410页。

③ 《新四军文献》(一)，第213页。

④ 同上，第216页。

⑤ 同上，第111页。

⑥ 转引自《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43页。

的继续发展,希冀回部工作是有利的。”<sup>①</sup>在叶挺去留问题上,中共中央显然没有采纳项英意见。

第二,项英确实也说过叶挺好话,叶挺从江北返回皖南军部之后,项英于1939年8月致电中央军委称:“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而且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错杀高敬亭是不符合中央意图的,项英这些话,怎么会对叶挺后来恢复党籍有影响呢?关于《项英传》所说项英1940年说叶挺好话的电报,我至今没见到。因叶挺于1939年9月1日前往重庆,后到香港、澳门,1940年7月底才回到军部。这期间项英不可能说叶挺的好话。叶挺指挥了10月皖南反“扫荡”作战,项英是否说了叶的好话,我没有看到电报,无法置评。

第三,叶挺后来重新入党,是叶挺以自己的革命实践证明他符合一个共产党人的标准,这与项英说了叶挺什么话没有丝毫影响。周恩来说:叶挺在皖南事变中“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sup>②</sup>,在被国民党囚禁五年多时间内,叶挺不为名位利禄所诱,不为生死荣辱所动,坚决维护了共产党的尊严,维护了新四军的声誉。正如党中央在批准叶挺入党的复电中说的:“你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sup>③</sup>《项英传》硬把叶挺重新入党与项英在处置高敬亭问题上说叶挺的“好话”联系起来,只是会使历史失真。再说,叶挺是重新入党,并不是恢复原来的党籍,因此,《项英传》在这个问题上,是双重的失实。

(三)《项英传》中说叶挺1938年秋辞职出走,是叶挺与项英商量好的,是叶挺为了“就近照应惠阳乡下和澳门两地的亲人”,想“回广东拉队伍,打游击”。项英还“派人送去几百条步枪,还曾经酝

① 转引自《周恩来传》,第444页。

②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5页。

③ 《新四军文献》(五),第679页。

酿给叶挺派一批粤籍干部”。<sup>①</sup> 不知作者是以什么样的“第一手史料为依据”来这样写的，但上述说法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第一，叶挺是当时国共双方均同意委任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辞职出走前，曾给国共双方发报，国共双方均表竭力挽留。项英为什么不向中共中央报告，就擅自同意叶挺弃新四军军长之职，而去南方打游击？这似不符合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如果确是项英与叶挺商量好的，那和项英在10月23日向中央的报告中只提叶挺“辞职愈坚”，而只字不讲到南方另拉队伍打游击的事，又属故意隐瞒，就更不应该。

第二，叶挺到广东，被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任命为广东东江游击指挥，这是随机而遇，纯属偶然。叶挺不可能事先预料到余汉谋会任命他为广东东江游击指挥，事先也不可能知道东江地区已出现刚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据周恩来、廖承志等人说，叶挺到了香港，听说他的家乡惠州周围一带已出现由华侨、学生与救亡青年及当地群众自动组成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于是他决定去看一看。因此，说叶挺去广东拉队伍打游击，是叶项商量好的说法似难成立。这种说法只能掩盖叶项矛盾，歪曲叶挺辞职出走的真正原因。

第三，项英“派人送去几百条步枪”的事，更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新四军自身枪枝就不足。1938年6月2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电报中曾指出：“枪枝可由地方与敌人大批取得，不必多花钱远处购买。”<sup>②</sup> 可见项英当时正想花钱买枪，哪来多余枪枝千里迢迢南送广东？叶挺是10月离开军部去广东的。11月24日项英在报告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叶无音信，大概跑回香港。”<sup>③</sup> 当时项英连叶挺的确切行止都心中无数，项英的枪枝往哪里送？且因蒋介石干预，

① 《项英传》，第404—405页。

② 《新四军文献》（一），第115页。

③ 《新四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2册，南京军区战史编辑室1964年编印，第146页。

余汉谋很快撤销了叶挺东江游击指挥的任命，叶挺在广东活动的时间甚短，很快就回澳门家中了。项英的枪枝是什么时候送去的？是派谁送去的？这些在项英给中央的电报中只字未提，难道项英是背着中央私行其事？

第四，说叶挺去广东是叶项商量好的，并不是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的，而是李一氓40年后的回忆。但他的几次回忆说法又不一致。最早见到的是：据当时的军部秘书长李一氓最近证实，叶挺这次离开前是与项英讲好了的，要去广东东江一带发展武装，进行抗日活动。项英答应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当时答应给五六百支枪，需要的营、团级干部也应支援。”<sup>①</sup> 后来又说：“他（叶挺）在走之前，曾和项英商量过，项大为赞成，送了几百支步枪到广东，还答应调一些广东籍的军政干部到他的部队中去。”<sup>②</sup> 李一氓在自己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中又说：“送了叶挺300支步枪，真正运到韶关去了。”<sup>③</sup> 在枪枝数量上就有“五六百支”、“几百支”、“300支”三种说法；前一种说法是“答应给五六百支枪”，后一种说法是枪已“真正运到韶关去了”。哪一种说法可信？据当时参加处理叶挺指挥部善后事宜的粤东南特委组织部长吴有恒和《叶挺将军传》<sup>④</sup>中说，叶挺到广东拉起队伍后，曾准备跟新四军领导人商量，调几十个干部支援东江游击纵队。作为一种打算，并未付诸实践。这种说法较合乎逻辑。

（四）《项英传》说，1938年“军部于7月1日由南陵土塘移至泾县云岭”，作者在此加注：“《新四军事人物录》第499页。”该书由《项英传》作者王辅一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关于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的时间，以往是有1938年7月1日说。但自从1985年新四军皖南军部原参谋处长赖传珠的《记》，

① 见《大江南北》1988年第5期《围绕“皖南事变”的是是非非》一文。

② 见《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李一氓谈皖南事变与项英》一文。

③ 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

④ 段雨生、赵酬、李纪华著，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陆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征集委员会的《党史资料》上刊出后，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1993年11月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卷等，均把军部移驻泾县云岭的时间订正为8月2日。

《赖传珠日记》是这样记载的：1938年7月22日，从南陵土塘“到云岭看房子的已回来了”；7月26日，“上午10时到云岭看房子，下午4时回来”；7月30日，“早9时到云岭看房子，并开始搬运东西”；8月1日，“继续运输东西。下通报规定出发时间”；8月2日，“7时30分出发，沿途群众放爆竹敲锣打鼓欢迎。10时到云岭，打扫整理办公室，讨论参谋处工作。”<sup>①</sup>7月下旬做移驻泾县云岭的准备，8月2日才正式移驻云岭。参谋处长当时的记录，真实可信无可置疑。

《赖传珠日记》1989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1995年10月出版的《颂英传》中，注明以《赖传珠日记》为依据的多达49处，其中包括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南昌，由南昌移岩寺的时间，都是以《赖传珠日记》为依据的，唯独军部由南陵土塘移驻泾县云岭的时间，不采用《赖传珠日记》的记载，而以作者自己主编的《新四军事事件人物录》中的说法为准，使人难以理解。

(作者单位：南京军区政治部《新四军战史》编辑室)

(责任编辑：荣维木)

① 《赖传珠日记》，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130页。